



三种“过度”教育分析

► 杨斌

我们对于教育的认知，普遍存在着一类看法——多学总没坏处，多教总是好的；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共识也认为，学位上高一级，总归是能力更强。如此这般“单调递增”的误读，近则影响到教学法、培养方案设计，远则关乎人生选择中的适当、有效，并非小事。这里，就想分析其中三种“过度”现象，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。

第一种过度，是在教学法上

有老师在教学过程中，恨不得把知识点、易错点甚至答题的技巧，都在课堂上讲清说透，学生们听下来的感受是，真流畅，很全很细。师生相互之间一对眼神，就领悟了这门课的“精髓”。不用翻书都能搞定所有作业——如果不能，大概率是布置错了题目。课后也真的不去翻书了，就这样逐渐地做好了课上洗耳恭听照单全收的心理准备。于是，上课就变成了听讲加记录。如果我们反思一下，这样的教学法，对于学生发现问题的好奇心、延伸学习的动力、自主探索的勇气，是促进，还是抑制？那么，我们也许会对这样的教学效果是否优秀，产生不一样的评价。

有研究者做过实验，演示了积木搭法和游戏解法后，学生们大都进入“重复实现、更快实现”的套路中；而若是

先让学生探索，其行为特征呈现出较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。另有研究者的荟萃分析发现，教师应用流畅、全面的“直接教学法”，学生在标准答案式的学业考试中成绩更优，而在处理现实问题、开放问题中却远远落后——这种现象有个看似矛盾却引人深思的名称，叫“失败的成功”，短期成功，长期却失败。

站在教与学这个责任天平的角度分析，当教师站位靠前、以推为主，那么学生也就退得靠后，责任担当得就少。此消彼长间，学生就不再跃跃欲试，就不那么有自主和自觉性，而容易滋生等靠要、求喂养的态度。责任分担，也有个“用进废退”效应。

第二种过度，是在培养方案的设计上

以本科教学为例，很多领域都有知识迭代、新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。于是，学校或者院系所设置的课程体系，因为很多新内容要融入，导致四年中要学的课程不断增加，学分数高企，学生叫苦不迭之外，自主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。

这其实反映出，我们对于本科教育的定位和要达到的目标认识不清、把握不准。四年本科的目标，不是把某个学科的完备知识悉数教给学生——那既不可能，也无法消化——而是要

■ 作者简介

杨斌，清华大学副校长、教务长，兼任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院长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，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。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《领导与团队》等精品课程。著有《企业猝死》《战略节奏》（合著）、《在明明德》（合著），译有《要领》《教导》等。



帮助学生搭建拥有这个学科的核心知识、能力、视野的“脚手架”，建立起可延伸、想延伸的一套认知体系，激发对未来的学习和成长更浓厚的好奇心和更自觉的内驱力。知识爆炸，学科进化，校长、院长、教师要吃透其核心要义——变化映射着哪些不变？哪些基础要打得更牢固？然后以“让核心更核心、让核心更能解释和指导变化”的方式——我把它称作凝聚和提炼的乘法——刹住这个只做课程堆砌的加法而迷失核心的风气。

坚持课程总学分不涨，坚守的是确保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条底线。毕竟课程学习只是学校学习的一部分，课外的学习与生活，集体的活动与实践，以及青少年思想和情感成长所必须有的“留白”“徜徉”，都十分重要，不能被一门门课名看似新兴而内容多为皮毛的课程挤占

甚至牺牲。

第三种过度，是“更高学位”迷思

学生和他们的家庭，都有着要一口气努力取得最高（至少更高）学位等级的压力；而对许多用人单位来说，也有着学位“高高”益善，就高不就低的倾向。二者相互作用，水涨船高。坊间只见考研热，越来越火，但身在其中即将读研的人，真的问过自己，这个硕士或博士，适合我吗？我真正的目的是在做学问（长本事），还是读学历（拿文凭）？而对用人单位来说，我们真的需要经过专门学术训练的某一学科的博士来做这个岗位吗？这份工作真的必须研究生才能胜任吗？

不错，我们现行的确实是三级学位体系，但是专业硕士、学术博士之间，更像是两种强调不

同类型、而非高低层级的职业选择，二者都是终极学位（terminal degree），培养出来都是要直接走向工作岗位的。专业硕士，是否一定比博士水平“差”？要我看，二者根本不具有可比性，而不是谁高谁低。

学位迷思激发了学生和教育机构的某种乱仗，申请报考者很多，但“真需求”却难说，存在某种“虚火”。在恰当适度地设置岗位胜任条件、敢于说出你“资格过度（over-qualified）”不适合录用、避免助长和激化“过度追求高学位”之风的转变上，党政部门、龙头企业必须要带个头。这将是一件有益于社会、家庭和教育机构，避免大量教育资源错配的善举。

过，犹不及。适，才是正道。教学法、培养方案，或是深造与选贤，都要先反思下是否“过度”。